

随感与遐思

想起了日丹诺夫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不成样子的怀念

名家最新

杂感力作

劝善说

美国人傻吗？

我的另一个舌头

中餐的命运

写作的快乐

沪上思絮录

全知全能的神话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

不争论的智慧

原子弹、健美操与精神食粮



王蒙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隨感與遐思



王蒙

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蒙
著

名 / 家 / 最 / 新 / 杂 / 感 / 力 / 作

随感与遐思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昌余
封面设计:何伟
版式设计:邓争旗

名家最新杂感力作

随感与遐思

王蒙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1,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200

ISBN 7-226-01585-4/I·421 定价:14.50 元

目 录

○欲读书结○

- 1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 7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
- 10 文学与地理
- 16 “头朝下”漫议
- 20 不争论的智慧
- 26 “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眼睛
- 35 旧梦重温
- 42 不成样子的怀念
- 51 名士风流以后
- 60 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 64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 69 后的以后是小说
- 74 想起了日丹诺夫
- 83 全知全能的神话

○文艺评论○

- 90 沪上思絮录
- 103 祝愿和希望
- 104 关于晚报文体

- 106 我写《暗杀——3322》
- 109 好戏还在后头
——复郅元宝信
附录：郅元宝致王蒙信
- 115 我喜欢幽默
- 117 想起了一篇好小说
- 120 为老友诗集作序
- 122 “不可就药”的幸福
——序徐恩存新著《中国石窟艺术》
- 124 美丽的红罂粟
——《红罂粟丛书》序
- 127 欢乐的文学联欢
——《都市迷情》序
- 130 阳光与荒原的追求
- 132 钟鸿的诗
- 135 《在伊犁》台湾版小序
- 137 为张长《淡泊的宁静》作序
- 139 妙喻如舟
- 142 作家——医生毕淑敏
- 145 行板如歌
- 149 先锋文学失败了吗？
- 154 贺《人物》十五岁
- 156 《夜莺和春天的对话》序
- 159 我的写作
- 161 官场无政治？
——读《将军浮沉录》
- 167 关于散文
- 169 我读《红楼梦》
- 172 开拓研究文艺心理学
- 175 艺术属于人类

-
- 177 清风 净土 喜悦
——在《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晚宴
上的即席演说

○散文○

- 182 焕然一新喜亦忧
184 哀悼高太夫人
186 往日情歌
188 写作的快乐
191 夏衍的魅力
196 感谢读者
198 诸神下界
200 怀念刘力邦同志
203 穷与富
205 中餐的命运
207 超级市场的食品
210 在小绒线胡同
212 漫游这个世界
215 珍惜家庭
217 科摩湖里游泳
219 湖

○杂文随笔○

- 222 劝善说
224 善良
227 清明的理性
230 雅与俗
232 单纯
234 杂多与统一

-
- 236 微笑与金钱
238 黑马与黑驹
240 冤屈的魅力
243 宽容与嫉恶如仇
246 说真话的风波
249 原子弹、健美操与精神食粮
252 文学与世界
256 随感与遐思
264 大愚若智话阿甘
266 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
268 本命年
270 恭喜声中话轻松
273 美国人傻么？
275 美国人更胖了么？
277 贝拉吉奥的“形式主义”
279 我的另一个舌头
282 爱国主义的内容
284 做好你自己的事
286 关于敬业
288 静下心来
290 也说歌星种种
293 珍重生命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译文》杂志上读到苏联作家巴甫连科(Навленко)的一个短篇小说《话的力量》(Сила Слова)。巴甫连科是电影《宣誓》、《带枪的人》、《攻克柏林》的编剧，很行时；他的长篇小说《幸福》我也读得如醉如痴。他的作品以正面描写与歌颂斯大林而著称，他是我当时最喜爱的苏联作家之一。

《话的力量》这篇短东西也是歌颂斯大林的，描写斯大林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一天有一个秘密会议需要参加，但是这一天第比利斯降临了暴风雪，天气极端恶劣，斯大林住得又远，人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但是了解他的人相信他一定会想出办法出席会议的，因为他说了他要来，说了要来就一定会来。果然，斯大林来了，斯大林是滑雪翻山而来的。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多半会被看做一个“然诺”的问题，叫做说话算数。而苏俄式的说法则在于话的力量，言语与语言的力量。这样一个关于话的力量的命题比小说情节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话的力量，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

言语确实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它培育了思想，沟通了人际，造就了社会，使人当真成为万物之灵。文字就更了不起，它突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变成了比人本身更坚固也更郑重的存在，所谓白纸黑字，万万大意不得。所以相传苍

颀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话能通神，这还不是话的力量吗？

话的力量的提法首先使人想起符咒的力量，对于符咒的相信，表现着人们对于话的力量的敬畏。虽然显得原始了一点，这也是一种信仰。各种宗教都是要祈祷的，祈祷也是说话，是与主与神说话，因而那也是话的力量的显示。至诚可以通天，笃诚的信仰能够焕发出奇妙的巨大的力量。

话的力量也是感情的力量。世上唯有情动人！而情是要用言语来表现的。

话的力量更是科学的力量，特别是逻辑的力量。理论掌握了群众便变成物质的力量，信然。

话的力量也表现为言语的艺术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无须解释。

而最最奇妙的是当具体的言语组成了博大精深的语言体系（顺便说一下，言语是具体的，而语言是概括的。“五讲四美”中的“语言美”云云，实为“言语美”之误）。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语言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便成为一个愈来愈独立的世界。它来自经验却又来自想象，最终变得愈来愈具有超经验的伟大与神奇了。它具有自己的规律法则，从而具有自己的反规律反法则（即变体）的丰富性、变异性、通俗性与超常性。它具有组合能力、衍生能力——即繁殖能力。它被人们所使用，却最后又君临人世，能把人管得服服贴贴。

好厉害的话的力量！能不慎哉！

是的，一个革命党，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是十分重视话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党在执政以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话语赢得了民心，取得了胜利的。她还没有执政，当然拿不出太多的政绩，而更多的是靠论证与许诺，而论证与许诺，不就是话语吗？我们强调说这是科学的话语，光荣的话话，无非是进一步强调这种话语力量。当然光靠话语也是

不行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实践，以实在的图景加强了这些话语的可信性。提起共产党的“宣传”，连国民党也不能不甘拜下风。

五十年代我常常阅读并赞叹于苏联的外交政治话语的煽动性、系统性、高屋建瓴性、洋洋洒洒性。不论是联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联合国大会上维辛斯基副外长的演说，都令我倾倒。那时的苏联是作为国际秩序的一个批评者、反叛者即旧世界的掘墓者而出现的，而人间的规律是批评别人往往比维护自己更加雄辩得多。

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野党在话语上常常占有优势，因为他们的政见他们的方略在执政以前往往只是一些理想型的因而显得相当完美的话语，而执政党却要为自己执政的实际——这种实际肯定会是不完美的、捉襟见肘的乃至千疮百孔的——进行拙笨的辩护。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呢，说话立即慎重多了，许多在野时说的大话也都收起来了，这时候强调的已经不再是话的力量主张的力量而是实际利益实际的可能性了。这时候他们相信的已经不是话的力量而是权与利的力量了。愈是有力量的话愈是难以兑现，各国莫不如此。这种政治游戏的常规现实固然有些可笑乃至可憎，却也可以理解。难道能设想另一种情况吗？难道能够是一个执政党大话连篇，而在野党句句掂量吗？

我们曾经十分地重视话的力量。“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话的力量有多邪乎！我们也曾经学习过苏联的做法，在一些大节日前发布口号，由党中央制定口号，这不是说明对于话语的重视吗？再想想那些大义凛然的论争吧，为了一个“提法”——“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过去方针”还是“既定方针”，我们斗得还少吗？这也是一种话的力量——可畏的力量吧。

广泛的政治学习，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批评与自我

批评，组织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转弯子与表态，一次又一次的讲用与传经送宝，所有这些都是话的力量的强调、表演与证明。多少人因为话而罹难，多少人因为话而直上青云！多少人以话为生——想想那些到处讲用的积极分子吧，再想想那些动听的话语吧！

我在新疆农村劳动的时候，一位维吾尔农妇听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蓝天和大地变成纸，把海水变成墨，让全国人民都变成诗人，也唱不完毛主席的恩情。”她惊叹道：“现在的人说话是多么会说呀！太棒了！太妙了！简直再也说不过了！”

是的，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常常感到，中国大陆出去的青年要比台湾来的会说会辩得多。我个人的“口才”也常常为人称道，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点什么口才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培育锻炼。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简单地说，话的力量就是思想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宣传的力量，“路线”的力量，批判的力量，政治斗争的力量。这些当然是有力量的。

但是这种力量也可能异化，也可能进入误区。这使我想起已故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的一首诗，他的诗里讽刺那些“用舌头攻占城池的英雄”。为此他被英雄的“舌头”们骂了一个不亦乐乎，整了一个死去活来。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话是有道理的。重话轻实的作风是会孵化出许多牛皮大王，巧言令色，投其所好、阳奉阴违来的。

话是一种有魅力的东西，说得多了不但能说动别人，也能说动自己。用巧妙的言辞去解决（实际上是不去解决）实在的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以那个很风行过一时的三点论来说吧，什么“对于天灾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承认，第二不怕，第三要克服它”，这样的十足的俨然颠扑不破的废话难道能解决任何问题吗？再拿大批判来说吧，想当初批得是何

等威风、何等花哨、何等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天花乱坠、仪态万方！什么对立面已经化为“齑粉”啦，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啦，什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啦，什么“玉宇澄清万里埃”啦，什么“战斗正未有穷期”啦，什么“大打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人民战争”啦……古的今的诗的散文的比喻的修辞的文的武的，各种话的力量用了一个六够，又有多大的真正的力量呢？又有几个是做对了或者做成功了的呢？

“眼见为实，耳听是虚”，类似的谚语已经表达了人们对于话的力量的一种怀疑乃至警惕啦。

显然，如果一个执政党不想搞乱自己，不想搞垮自己的话，在执政以后就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过渡到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上来。执政党而又成天价唱高调，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样做不但分散了精力，干扰了建设，干扰了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了政绩，毒化了空气，败坏了风气；而且在人们愈来愈不相信高调的同时，人们不是用高调来约束自己，恰恰是用高调来要求执政党，从而会用理想主义的高调来将执政党的军，使执政党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历史证明，高调常常是颠覆的武器而不是建设的武器。以话的力量搞斗争尚可——也不能光靠话的力量，而是还要靠身体力行的力量——以话的力量搞执政搞建设就会大谬不然。如果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人人都迷恋于话的力量，人人都善于发挥话的力量，人人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言不惭，吹牛皮不上税，一句话，如果我国出了十二亿政治家演说家批判家口力劳动英雄，我看这个国离亡掉不会太远了。

所以，现在提的是不争论至少是少争论。确实是一大发明贡献！确实是要紧得紧！连姓社姓资这样的最能够表演话的力量的节目都暂时搁置起来了——我说是暂时，因为这方面的那股“话的力量”说不定还在大大地积蓄着，等待着爆

炸呢——遑论其他！

现在强调的是经济建设。很可惜，经济的发展，常常并不决定于话的力量。过分膨胀了的“话”，该收缩收缩啦！

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税多，说的是钱加权的力。会多，说的是话的力量。现在共产党的会也渐渐少起来了，而税，不免要渐渐多起来。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必然的过程。希望那些过往深受膨胀了的话的力量之害的人们少安勿躁，不要太怀念与急于召回那种吹大了的话的力量。

话太少了也不行，就是说还得有精神，还得有价值取向，还得有文化的凝聚力。光有行政的凝聚力或行政的禁止力是不够的。当然话的力量仍然存在，而且不能忽视，本文说的，只是请它回到应有的位置去罢了。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巴甫连柯，他所吹的斯大林的话的力量也不仅是话语本身，而是一种说了就做的力量，归根结底，话的力量只能依赖于实践的力量。诚则灵虽然暂时有效，却毕竟是一个颠倒了命题，诚只可能暂时地与局部地成为灵的前提，灵其实才是长远的与根本的诚的前提。就是说，灵才能诚。老是不灵，诚就会变向反面，这就会非常非常麻烦。现在是强调实践的力量，强调实践的灵才是诚的前提的时候了。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这个变化是意味深长的。

1994年2月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台北联合报系主办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上，针对某些论说，我发言说：

讲老实话，一些评论家的概括，对于创作家来说，其实是倒胃口的。当我迈动左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左派，当我迈动右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右派，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臀派，当我梳头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发派……罪过罪过。我的打击面也许太宽了……笑声和掌声淹没了我的话。

放肆了！我的这种对于评论家的不敬的戏谑之词，是指的那种以几个通用概念直线地现成地判断一切作家与作品的所谓评论家。这里边可不包括本文要说的邵元宝和许多严肃的批评家。

……一九八八年年底，一次偶然的会使我翻到了邵元宝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两篇文章。我立即被他的文章所吸引。

我觉得那是与作家也是与读者的在深层次上的对话。他有情理丰茂的文学—艺术的语言，那是作家的语言，也是思想家的语言。不像有的评论文字，通篇充满文件的语言，社论的语言，大字报的语言，汇报的语言，批示的语言，乃至专案组的语言，就是没有作家的语言，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这样的评论家讨论问题，实在只能说明自身的愚蠢与难以救药。

而部元宝是在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去捉摸作家的心。透过字里行间，描写叙述，他体察着你的热情，你的苦恼，你的诚实和你的含蓄。他特别能抓住你的自相矛盾，你的自我折磨，你的欲说还休，你的满不在乎的潇洒中的内心深处的伤痛。他知道你的成功，更知道你为这成功而付出的代价。他知道你的失败，更知道你的失败背后的酸甜苦辣。

他是在用他自己的心——既不会与作家的心悖谬也不会与作家的心重合——与作家的心对话，更用自己的心冲向扑向作家的心。如果是一个旁观者，对于这种心灵的冲撞，他会感到兴奋；他甚至于也会觉得紧张，如果不是恐怖的话。

而另一些自为以才高八斗的吹胀了的评论家，不看完作品就敢捧杀棒杀；读几行就可以写几页，只读过你的作品的十分之一就敢对整个作家下结论。他们看见头屑就戴帽；看见剪落的脚趾甲屑就套皮鞋；听见笑声就责备你的匪恭匪谨；闻到屁味就给你塞痢特灵。他们像是宠坏了的孩子，天真而又骄傲地随时宣布他们已经证实了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航行了全部海洋；世界已经被他们征服而真理才刚被他们首先发现。他们那么急于填平他们只尝了几杯水的江海，那么急于把非己的一切送入垃圾堆至少是博物馆。他们还动辄自我做古，宣布文学史应该也只能从他们哥儿几个开始，整天吹什么中国无文学，中国只有两个半小说家，中国文人都是娼妓；或者另一种极端，说是由于他们没有中举掌印，邪恶瘟疫泛滥了多少年，所以多少年来只有类黑线专政，只有一片黑暗之类的痛心疾首的昏话大话。

部元宝也试图做一些概括，这些概括也或有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意味，更有他自己的借酒浇愁、借题发挥、直到李代桃僵的操作。但是他毕竟在深思熟虑，他力透纸背，他穷追不舍，他独出心裁，他深深切入；他的概括即使使你无法首肯，也还是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使你激动，使你震惊，使你深思，使你欲罢不能，使你快乐或者痛苦，

使你一夜一夜地睡不好觉，使你长叹一声：“好你个郅元宝！”

就是说他的评论是一种自己的发现；是思想的挑战，至少是思想的真材实料；是一种灵感的由头，是天光暴露、豁然开朗的先兆；是一种话语的柄把，是大好文章的开篇；是投到湖心的一块激起波浪和涟漪的石头，是一束能点燃起熊熊火焰的火把，是一颗多少打进了你的身体（虽然很可能打偏了）的子弹。

至于不足，我觉得这位青年评论家的评论仍略嫌贪大求深有余而精琢细磨不足，思想发挥有余而艺术把玩不足，认真严肃有余而通达趣味不足。对于文章的细微处，对于艺术的细微处，对于形式的细微处，对于文学的趣味与游戏处，他下的工夫与心领神会还是太少太少了。小处着手的東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梳剔剔微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潇洒神游的东西还是太少太少了。对于文学的和光同尘的世俗性的认知还是少了。在“博士”全球的同时继承中国文论的传统也不足。

当然这种遗憾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时文的传统、习惯与风气使然。

他还没有“红”。我祝愿他再多寂寞个相当的时间。免得红得发了烧，匆匆忙忙得胡说八道起来。

1994年3月